

美国的乡村生活运动

■ 史 磊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20世纪初,为了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美国社会各界自发兴起了一场改革运动,乡村生活运动是此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运动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关注和成立乡村生活委员会开始,通过委员会的广泛调查研究,发现了美国农村普遍存在对土地工作者固有权利漠视、公路交通条件差、土壤退化、农业劳力缺乏、乡村卫生健康状况不佳等问题,进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美国乡村生活运动 乡村问题 乡村生活委员会

美国内战结束后,由于奴隶制问题的解决和西部边疆的大开发,美国社会迎来了一个经济和社会飞速发展和变化的时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已跃居世界首位,城市化进展也很迅速,城市人口比例已接近总人口的一半。然而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政治腐败、经济垄断、城市贫民窟的扩张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改革运动,这些改革运动被后世的史学家称之为“进步主义运动”。进步主义运动开始时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然而由于美国当时仍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过渡阶段,乡村人口当时仍占美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因此,许多改革者逐步意识到了乡村问题的重要性。

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与乡村生活委员会

(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乡村问题的关注和认识

作为一名政治家,罗斯福首先考虑的是当时社会急需解决的工业和城市领域的问题,乡村问题在进步运动兴起之初并没有受到罗斯福的关注。

罗斯福重点关注乡村问题始于1907年,这首先与第二年所要举行的总统大选有关,争取农民对共和党的支持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其次也与其对自然的热爱之情分不开的。罗斯福从小就对自然风景和奇观充满向往,进入大学之前,他的理想一直是做一名博物学家。尽管后来选择了从政,但他的这种热情并未减退,而是融入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行动当中,他以后所支

收稿日期:2017-03-10

作者简介:史磊,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世界史、美国史。

持的自然保育运动就是很好的证明。此外,罗斯福对乡村问题的关注也因受到了一些乡村改革者的影响。利伯特·贝利等相关专家积极向罗斯福呼吁,敦促他关注乡村问题。罗斯福的好友、时任森林局局长的吉福德·平肖也多次要求总统对乡村问题予以重视,他向罗斯福提出了由总统出面成立一个总统委员会的提议,因为这样可以避开国会的刁难。罗斯福很快接受了这项提议,并在1908年4月约见贝利等人,讨论成立乡村生活委员会的事宜。

(二)乡村生活委员会的任命及其活动

1908年8月20日,罗斯福任命的乡村生活委员会正式成立,其成员最初包括:主席利伯特·H·贝利,农林学家康奈尔大学农业学院院长凯恩·L·巴特菲尔德,乡村社会学家、马萨诸塞农业学院院长沃尔特·H·佩基,农业和教育界权威《世界工作》杂志编辑吉福德·平肖,著名进步主义改革者美国农业部林业局局长亨利·C·华莱士等。

罗斯福希望委员会能在自己卸任之前,也就是1909年3月之前的几个月内,向政府提交关于乡村生活问题的报告。这个任务使得委员会每个成员都感到压力颇大。经过一番讨论,委员会决定采取以下三种方式完成对乡村信息的采集:其一,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做好独立的调研工作,最后向委员会汇报;其二,于1908年11-12月间,在30个乡村举行听证会,听取村民对于乡村建设的意见;其三,以委员会的名义向乡村居民和与乡村生活有关的组织发放调查问卷,村民地址由农业部帮忙提供。到了1908年12月,罗斯福总统向全体乡村居民发起号召,让他们在12月5日这天到自己所在地区的乡村学校中举行集体会议,讨论美国乡村的现状,并向委员会反映自己的意见,这可以看作是第四种形式。在这四种形式中,发放调查问卷是委员会获取乡村信息的主要手段,而对问卷结果的综合分析也是他们评估美国乡村现状的主要依据。

根据农业部提供的地址,乡村生活委员会从1908年10月起,总共对外寄发了五十五万余份调查问卷,最后收回约十一万五千份^[1],回收率在当时看来还算不错。问卷总共包括12个问题,涉及农舍、乡村学校教育、农民收入、乡村通讯条件、组织化产销、农业劳工、乡村信贷服务、乡村卫生状况、农民的社交和娱乐生活等九个方面的内容。问卷调查的对象当然主要是农民,但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把“开放的乡村”作为调查范畴,邮递员、乡村教师以及与乡村相关的工商业人员等也在调查问卷的范围,并且还占到大约30%的比例。

回收问卷的原稿现在已经不得而见,它们被威尔逊时代的农业部长D·休斯顿下令损毁。不过,还有九万四千余份的问卷被委员会整理并编制成表,并且保留在与贝利有关的文献中。从这些保留下来的资料统计来看,引起乡村居民普遍不满的问题主要有:组织化营销发展缓慢,农业劳工供应不足,乡村学校教育不尽如人意,乡村的社交和娱乐生活匮乏。此外,对于经济收入问题,回答满意与不满意的人数大致各占一半,其中不满意的回答主要来自南部地区^[2]。而对于乡村的卫生条件等5个问题,多数农民则表示目前还比较满意。

举行听证会是乡村生活委员会获取信息的又一重要途径。听证会邀请了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到会旁听,而会上的主体是农民代表。他们每人在规定时间内向委员会陈述自己对于乡村问题的看法,也可向委员会直接递交文字材料。在1908年11-12月间,委员会共在全美各地举行了30场听证会。

二、乡村生活委员会提出的美国乡村问题

(一)美国的乡村问题

乡村生活委员会在1909年1月按时向总统提交了报告,报告总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概

论、乡村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在需要付之行动的改善措施。概论主要介绍了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和将要采取的主要行动,报告的后两部分才是主要内容。

报告第二部分共列出了当时美国乡村生活中所存在的六项主要问题:对土地工作者固有权利的漠视、公路问题、土壤退化及其影响、农业劳工问题、乡村卫生健康状况和妇女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土地工作者固有权利的漠视。共包括四方面内容:(1)投机占地。这主要是针对租赁制和遥领地主而言的。委员会认为土地应该属于那些真正从事耕种、并以其为生的人,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价值。而租赁制和遥领地主的存在则导致效率低下。委员会建议通过法律途径限制占地规模,特别是在对全美七千多万亩沼泽地的开发利用中,更应该防止类似情况的出现。(2)对水资源的垄断控制。委员会认为,河流对于农民来说作用重大,在灌溉、运输和能源等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而现在,法律规定的获取水资源的途径过于简单,致使“乡村地区33%被开发的水力资源都集中控制在13个公司和利益集团手中”,这对于乡村发展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农民要想成为自己财产的主人,就必须占有水和土地两种资源”。因此委员会呼吁对全国水资源的控制展开调查,保证农民拥有水源。(3)对森林资源的浪费和控制。委员会认为,对公众来说,乡村的林地资源“在控制水资源,防止水土流失,阻挡风沙和增加地区吸引力方面都有着重要价值”。因此委员会建议建立森林保留地,合理开采森林资源,同时也要像对水资源一样,防止森林资源受到垄断控制。(4)贸易限制。委员会在报告中写道,在听证过程中,大多数农民都在抱怨“运输公司和中间商一方存在的不公正、不公平和歧视”问题及一些中间商对农产品销售额的分享超出了自己的服务应得额的问题。针对以上四个问题,委员会还提出了当时需要采取的几项针对性措施,包括尽快实现乡村免费邮递、全面深入调查商业活动、彻查税收与农民福利的关系以及通过立法途径来保护农民固有的权利等。

第二个问题是缺少良好的公路交通条件。这是报告中提到的“在听证会中,教育和好的道路是被农民最经常提起的两项要求”。良好的道路交通不仅有利于农产品上市,也有助于提高乡村的社会地位。报告认为,对于该问题,当前主要是如何组织和资助修路工作。当然联邦政府应该承担一定的资助责任,而现在首先要在联邦政府中建立一个道路服务机构,以此来制定一项全国性的计划,并协调联邦和州之间的工作。

第三个问题是土壤流失。这里说的土壤流失主要指土壤被过度开垦而导致肥力下降。委员会认为肥沃的土地是农民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必要保证,尽管合理开垦肥田未必意味着高尚的思想和良好的社会,甚至可能导致对土地的贪婪和拜金主义;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财产保障,高尚的思想绝不会觉醒。因此必须倡导科学种田,并改变单一的作物种植体制,建立多样的、自我循环的农业种植体制,以此来保存和改良土地肥力。

第四个问题是农业劳工问题。在委员会看来,这个问题不仅限于农业领域,由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各领域都存在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具体到农业领域,租赁制的发展、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等又加重了这个问题。委员会认为,当前劳动力减少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要解决该问题,“目前唯一的现实方法只能是改进农业耕种方式”,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可以把较少的劳动力转化为乡村的常住劳动力。在委员会看来,最好的农业劳工是常住劳工,只有常住劳工才会关心乡村社会的发展,那些短工和佃农是不会真正关心乡村发展的。委员会还呼吁雇主主动关心劳工生活,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缩短工时。社会组织也要积极投身为劳工提供教育、通讯等方面的服务,特别是要帮助工人们戒除酗酒的坏习惯。

第五个问题是乡村的卫生健康问题。委员会认为,乡村的住房和一些公共场所的基础卫生设施都比较差,再加上环境的污染等问题,使得疾病的传播非常容易。同时,乡村地区的医疗条件也远比不上城市,药物和医生都比较缺乏。对于该问题的解决,委员会认为首先是要加强基

本卫生常识的教育,使人们明白疾病原理等知识。他们主张在乡村学校教育中开设相关课程以实现此目标。其次,州和地方政府还要改进对乡村社区公共卫生的监控,“联邦政府也应被授权向有需求的地区随时派出自己的卫生官员,以做好对公共卫生的调查和监管。”

第六个问题是乡村妇女问题。委员会认为,“乡村生活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这个组成部分”的参与。而现在,她们不仅要持家,还要帮助丈夫做一定的农活,生活负担太重,生活内容孤独单调,因此急需减轻她们的生活负担,并丰富她们的生活内容,使她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参与社区的重大事务”。要达到这一目的,委员会认为还是要靠“乡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家庭中的协作精神、家务的简化、生活设施的改善等,其中最主要的两项是要让男人们了解妇女问题和加强妇女间的合作精神。

(二)改进建议

针对第二部分提出的这几项问题,报告第三部分提出了现在需要采取的主要行动,主要包括五项内容:农业和乡村生活调查、改变教育方向、合作工作、发挥乡村教会的精神作用、提高个人思想水平和地方领导力量。在委员会看来要改善乡村生活,首先必须展开全面的农业和乡村生活普查。委员会认为,“除非我们完成一番对整个乡村的详细调查,否则我们在建设美好乡村生活方面不可能取得最优秀和最持久的进展。”委员会建议在已做的地理调查的基础上,对乡村地区的土地、交通、市场、种植体制和居民的经济社会状况等14方面的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调查。委员会不仅强调调查的范围要广,更加强调查要注重细节,并抓住当前问题的核心。此外,这项工作要在全中国范围内广为推广,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要互相配合,共同做好调查工作。

乡村生活委员会把教育看作是改进乡村生活最重要的手段,认为“现在所有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取决于教育问题”,而对教育的改革则主要通过对乡村学校的改革来实现。乡村教育首先是获得有关农业和乡村知识的最主要途径,委员会根据贝利等人的思想,主张将自然学习、乡村经济学和社会学引入现有的学校教育,此外,家庭经济学和医疗卫生知识等也应该置于学校的课表之中。委员会还认为,乡村学校不仅是教育机构,也应该成为乡村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由于学校是由公款支持,并且是一个与政府和社区相联系的机构,它应该成为一个自然的组织中心”。因为当它成了中心后将起到整合各种改革力量的作用。委员会最后还进一步提出,教育要融入普通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去,成人教育也要得到应有的关注。学校教育是为乡村培养后备人才的,现在那些正在耕植土地的人也应该进一步接受教育,以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为此,委员会大力倡导开展全国性的农业教育推广工作,通过短期培训、建立农业示范田等方式,向成年的农民提供科学教育。各类农业学院和各地的农业试验站应成为主要的成人教育服务机构。

委员会的第三项建议是倡导乡村居民合作,这“不仅是为了增进他们的经济利益,使他们能同其他已经组织起来的人竞争,也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发展和形成一种有效的社区精神。”在委员会看来,当前存在的农民合作组织或被少数寡头控制,不能代表多数成员的利益;或组织联系不紧密,很少举行活动;或主要集中在经济合作领域,忽视了社会方面的合作。因此急需建立一些由村民自己控制的、合作紧密的乡村社会组织。而对于目前存在的经济合作组织,委员会特别强调发展乡村合作银行和信贷机构,以求用有限的资金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资助。对于组织工作的开展,委员会强调自愿原则,认为政府只能通过法律途径为组织的成立提供方便,而非直接插手农民组织。

改革乡村教会也是委员会主要关注的问题。尽管在问卷调查中委员会回避了这个敏感的问题,但最终还是将该问题写入了报告。在委员会看来,“当前乡村社区的最大精神需求是更

高的个人和社区精神”，而教会正是提供这种精神需求的主要机构，应该成为乡村精神生活的支柱。但目前，乡村教会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教派林立，财力严重不足，没有固定的牧师。这些都导致了现在的乡村教会只是做一些礼仪方面的工作，无法深入村民的生活中去，因而也就无法满足村民更高的精神需求。对此，委员会建议主要从两方面进行改革：一是支持乡村教会的联合运动，使教会摆脱教义的分歧，共同服务于乡村的精神生活建设；二是为乡村教会培养专门的、专业的牧师。关于牧师问题，委员会认为，乡村牧师应该成为社区的主要领导人，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常住在乡村，并且了解有关农业和乡村生活的相关知识，而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就必须提高乡村牧师的薪金水平，并组织他们进行相关专业的培训。

委员会的最后一项建议是关于改革领导权的问题。在委员会看来，他们所做的工作只是指导性和建议性的，乡村生活的改善最终还是取决于村民自己，特别是乡村中的青年们。因此，乡村生活运动的更高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乡村社会，从而使得乡村能够留住并吸引更多青年人。

乡村生活委员会的工作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也为罗斯福总统和委员会的成员赢得了巨大荣誉。一位农妇曾给罗斯福总统写信，称赞“他是受到了神明的启示而去努力理解农民生活的苍凉”^[3]。乡村生活委员会的成员们也收到了很多的赞美信。委员会报告出版后，美国的传媒领域也掀起了一股讨论乡村问题的热潮。

三、乡村运动改革及其影响

报告出台后，乡村运动改革者们主要进行了四项改革乡村的工作：第一，进行全面的乡村社会调查，以求更加全面地了解美国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在乡村生活委员会报告的指导下，调查的范围也从纯粹的农业问题，如农业技术、产品市场和土地问题等，转向了包括乡村教育、道路交通和乡村教会建设等问题在内的全面调查。比如1910年，沃伦·威尔逊在其领导的长老会国内传教团内部组织成立了教会和乡村生活部，并在各地的分团中也成立了类似的部门，专门负责乡村生活和教会的调查工作。从1910-1912年之间，该部门在印第安纳等10个州展开了一系列的大规模乡村生活调查。这一系列的调查相当全面，在调查对象上，它既包括对个别有代表性的郡的具体调查，又包括对县所在地区的调查；在调查内容上，它既包括对农业和乡村经济生活的调查，又具体突出了对乡村社会生活和教会的特别关注；在调查范围上，它既囊括了美国东部、中西部、远西部和南部各个地理区域，又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第二，改革乡村教育。改革者和各地的教育督学合作，对分散的乡村学校进行合并，并对合并后的学校进行标准化评估，评估的标准包括五项内容：校园和附属建筑、校舍的物质条件、室内设施及供给、课程设置和教学质量。改革活动也得到了许多州议会的立法支持，比如1919年，艾奥瓦州议会通过了《艾奥瓦标准学校法案》，规定每年主要由州财政拨款，向进入“标准学校”学习的学生提供6个月的资助。资助分为两部分，一半用于学生支付教师的薪金，另一半主要用来购置学习器材等物品。除了学校教育改革外，乡村改革者们还积极倡导乡村教育推广工作，对正在从事农业的成年人进行短期的职业培训。第三，组织农民召开讨论各种乡村问题的会议，引导农民组织化合作。早在罗斯福乡村生活委员会成立之前，一些乡村改革者已经在通过召开乡村生活会议的方式，引导农民进行合作化的生产和销售了。乡村生活委员会成立后，各州纷纷效仿成立本州的乡村生活委员会，专门负责召开乡村生活会议。到了1914年，共有14个州组织召开了关于本州乡村生活问题的会议。与此同时，跨州的乡村生活会议也开始兴起。第四，革新乡村教会，改善农民的精神生活。早在19世纪末的时候，美国就有部分教士开始关注乡村教会问题，并从

事相关的改革活动。这个时期的乡村教会改革主要围绕教会联合、牧师培训、提高牧师待遇以及建立乡村牧师常驻制展开。美国当时几个主要的教派,如长老会、卫理会、摩拉维亚派和基督教协进会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到了乡村改革的浪潮中。这些教派纷纷成立有关乡村教会改革的部门,进行乡村调查,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验。罗斯福乡村生活委员会成立之后,各个教派纷纷成立了与乡村工作相关的部门,着手在部分乡村辖区内建立“示范教会”。卫理派在1916年成立了乡村工作部,他们在全国的教区中选择了几个区作为试点,通过提供高薪水和牧师公寓的方式,招募派内牧师来做全职的乡村牧师。乡村工作部则负责联系各农业学院,为新来的牧师提供培训,共有1200名卫理派牧师参加了培训。在示范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后,工作部扩大试点范围,建立了40个地区性的乡村生活社团^[4]。这些乡村社团服务的教会负责对该地区的乡村社会做全面的调查,并在之后制定出该社团的改革计划。两年后,已有十来个社团的教会拿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这些教会大都致力于主动服务乡村社区,他们加强了不同派别教会间的合作,改善社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建立教会图书馆,丰富居民的娱乐生活。在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社团,教会提高了牧师的薪水,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入会,使得教会的社区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美国的乡村建设思潮及改革实战,在1920年前后经约翰·杜威介绍到了中国。杜威于1919-1921年应其弟子胡适以及陶行知等人的邀请,在中国各地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访问和讲学活动,其思想对中国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影响了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们。乡村建设派们也试图通过教育等手段来改造中国农民,实现所谓的民族改造或民族自救。他们采取的措施和美国的乡村生活派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先是成立各种农村问题研究机构,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来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然后是在他们选定的实验村,通过对乡村进行科学调查和建立现代乡村学校以及图书馆等方式,向农民普及科学耕种和养殖的知识,引导农民致富。他们也积极寻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帮助,来改善乡村的交通和卫生条件等。此外,梁漱溟等人还非常重视乡村的移风易俗,强调通过重建乡村儒家伦理的方式来重建乡村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民国的这场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在少数地方(如重庆的北碚等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体上来看,并没有起到整体上改造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目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管是美国的乡村生活运动,还是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它们都是由少数具有“乌托邦”式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发起的运动,这些知识分子对当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趋势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多数农民终将进城的历史大趋势,对乡村生活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田园牧歌式幻想,试图以建设乡村“乌托邦”的方式来化解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这导致他们的理想与农村问题的实际情况和农民改善自身处境的需求相脱节,以致收效甚微。

[参 考 文 献]

[1][3] U. S. Congress. Senate Document No. 705, 60th Cong, 2d ses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Country Life, New York: Sturgis & Walton Company, 1917, p. 54, 128-138.

[2] Olaf F. Larson and Thomas B. Jones, The Unpublished Data from Roosevelt's Commission on Country Life,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50, No. 4 (Oct., 1976), pp. 588-597.

[4] William L. Bowers, The Country Life Movement in America: 1900-1920, London: Kennikat Press Corp., 1974, p. 92.

(责任编辑:任天成)